



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徵集舊照片之途徑

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纂

卞鳳奎

自民國76年政府宣布解嚴以後，臺灣本土文化如雨後春筍般的迅速發展，臺灣史於是成為當下之「顯學」，臺灣史之相關史料與檔案如國史館、臺灣文獻館（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）所典藏之《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、《台灣拓殖株式會社》、《煙酒專賣》等檔案陸續開放提供史學界之專家學者使用外，昔日之老照片，雖在早期較不為學院派所接受，但近年來亦在各界之專家學者的肯定下，迅速的被挖掘出來，特別為各界所青睞，更成為當下炙手可熱之重要的臺灣史料。許多學術單位早已開始著手利用老照片為題材，出版相關之作品；如宜蘭縣史館之《宜蘭文獻》即多次以影像資料為題材，專題介紹宜蘭當地之歷史；再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，不但於86年以圖像為主題出版《台灣歷史圖說》等，自今91年起，更與國立藝術學院合作，執行老照片數位化之計畫，透過該計畫，預定將二萬餘張老照片數位化建置存檔，除可永久保存外，將可方便提供各界使用。而民間利用圖像；特別是老照片為題材之出版物，數量更是龐大，足見老照片之價值已普遍為史學界所接受。以下本文將以臺北市文獻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臺北市文獻會）如何蒐藏老照片，及在蒐集時所遇見的困境等，作一粗淺的介紹。

影像史料的重要性

一、作為文化變遷之佐證

誠如國人所知，臺灣四百餘年來，共經歷荷西時期、明鄭時期、日據時期、國民政府

等不同民族、政府的統治。在各不同政府的統治下，各種文化、樣態、思想等亦隨之改變。史學家除可藉由文獻史料的佐證，說明或介紹昔日上述各種文化的不同外，透過影像；即舊照片則是最實際的佐證方式了。例如從圖一中可清楚的看出二個時代人物，在文化、思想上的不同。這張照片是洪雲騰先生與其孫洪長庚於1899年時之合照。洪雲騰先生是清朝的貢生，劉銘傳在臺時推動近代化的重要功臣，是以臺灣雖為日人所統治，但其服飾上可清楚的看出，其思想與生活樣態上仍是維持昔日之生活樣態，但其孫洪長庚的服飾及髮型及其鞋子，可清楚的看出已完全日式化。



圖一：透過影像可作為文化變遷的佐證。圖為清朝貢生洪雲騰與其孫洪長庚於1899年合照影像（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二、保存昔日生活之樣態

如前所述，臺灣島內經過多次不同政權的統制，或因意識型態的不同，或因族群文化相互的對立，許多島內原保存的文化，以及相關的文物，經常遭遇到人為的破壞，造成國人歷史和文化記憶上的斷層。爲了能讓昔日歷史完整的保存並呈現給國人，保存這些珍貴的影像史料，尤其是幫助下一代的研究者，透過影像史料的呈現，就必需作好各種題材的影像紀錄。例如從圖二中可看出，座落於今日臺北市仁愛路與中山南路交會口的東門，經過清朝、日治與民國三個不同政權的更替，其景觀亦呈現出不同風貌。這張圖片可看出清朝時期所建的城牆已拆除，並在旁邊開始架設電線幹。但至光復以後，政府單位又將該城門由閩南式，改爲現今北方式之樣式（如圖三）。是以倘若昔日無將舊照片拍攝並保存下來，國人則無法認識到東門往日的景像了。

臺北市文獻會舊照片蒐集沿革與徵集方式

一、蒐集沿革

臺北市文獻會成立於民國 41 年，由於爲全國首善之區，是以經濟、資訊及文化等均集中於此，重要文獻亦較易在此發掘。昔日著名的牯嶺街、廈門街等地，即爲舊書籍、文獻及重要史料之集散地。臺北市文獻會即在該地蒐集和購置到相當多之老照片，其中以日據時期爲最多。惟如前所述，昔日因國人對臺灣史；或本土文化較爲忽視，是以相關文獻史料，特別是與日本有關之老照片，並非是文獻單位主要的典藏重點，因此，本會老照片之蒐集雖在牯嶺街該地之數量爲最多，但其數量仍是有限。自 62 年時，牯嶺街因易遭水患之關係，幾乎全部遷移至位於八德路一段的光華商場，至今僅留下 5 家左右舊書商的淒涼景象，已無法想像到昔日其風光燦爛的情況。而光華商場之舊書商，也隨著時代的變遷，爲能順應當下之潮流，經營項目亦多以青少年之消費爲主要對象，不得

不改變經營內容，是以老照片的徵集則面臨到相當大的障礙與困境。現今可能僅有林漢章先生等少數幾位有在經營老照片的銷售。

二、徵集方式

1. 工作人員的興趣所帶動

如前所述，早期臺北市文獻會在牯嶺街、廈門街等地爲採集文獻史料之重心，蒐集到相當多數量之老照片，而當時之所以會積極蒐及文獻史料或古文物等，與昔日之主事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，例如早年本會業務推動之重心爲編纂組，而該組可發揮的空間極大，蘇得志先生、王詩琅先生均對蒐集史料不餘遺力。至民國 52 年王國璠先生擔任本會執行秘書後，基於各人之興趣，對文獻史料的蒐集；特別是文學史料，更是投入，是以本會早年之舊照片之徵集成果，前述 3 位前輩可謂功不可沒。但隨著前輩們的退休，再加上本會業務日漸朝活潑性方向轉變；再加上牯嶺街因昔日之舊書店異地他遷，且書商之經營策略亦有所改變，是以本會昔日徵集老照片之途徑因而受到限制。

2. 從舊書中翻拍

由於上述前輩雖有在積極蒐集，但因先後退休後，再因整個大環境的變遷等因素，個人興趣來帶動徵集的途徑已不可取，是以本會自民國八十年代初期開使，採以早期；特別是日據時期的出版物，取其中與臺北相關之照片，作爲主要翻拍之對象。所翻拍的書籍有仲摩照久編之《日本風俗地理大系台灣篇》、多倉喜作編之《台灣銀行四十年誌》、臺北市役所編之《台北市政二十年史》、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之《台灣蕃族圖譜》、伊能嘉矩之《台灣文化志》、等爲主要題材。而以日據時期爲翻拍對象，是因爲日據時期的結束時間爲民國 34 年，已過了著



作權保護的時限。臺北市文獻會所藏近二千張的舊照片中，以從昔日舊書籍內翻拍者占最多。

3. 熱心人士的捐贈

口述歷史 (oral history) 是人類自有語言以來，就開始使用的一種傳遞知識的方法，近年它不但成為研究歷史的「顯學」，由於口述歷史內容生動活潑，又能補足文獻之不足，是以更為學術界所借重。本會自民國 41 年成立以來，即積極從事口述歷史之徵集，而在徵集過程中，亦會遇到熱心之文士，願意將手中保存多年之舊照片捐贈本會，或借本會作翻拍之用，此為本會蒐集舊照片的另一重要途徑。以筆者個人為例，於民國 83 年在作臺北木柵、南港二區之茶農口述訪問時，就從茶農獲得相當豐富的第一手舊照片。再者，筆者於民國 84 年和 85 年，在作北投地區之溫泉和士林地區之調查時，亦從當地耆老手中，借用相當多的舊照片翻拍。而圖一這張萬華洪騰雲家族老照片，即是筆者在向其家族作口述訪問時，洪氏家族所熱心借予翻拍的。諸如此類之案例相當多，可謂不勝枚舉，筆者認為只要在訪談時能表現自己的誠意，相信受訪者均極樂意將手邊的珍貴史料或文物提供給國人參考。

文物採集的限制

相信各文獻或圖書館界的承辦單位，雖有心積極徵集各種重要文獻或文物。但每遇到相關法令的限制，或是民間蒐藏家時，想必再認真或熱心的業務承辦人員，倘若無上級長官的明確支持，必定會退縮不前。一般而言，業務承辦人通常會遇到的困境可能是下列兩種。

一、採購法的限制

政府之採購法於民國 87 年 5 月 27 日開始正

式實施，許多文化單位限於法規之規定，雖然透過種種管道，發掘到珍貴之老照片，但卻因法規之限制；如在十萬元以上的文物，必需採上網公開招標等限制，否則有圖利商人之嫌，因而無法採購典藏，而讓這些珍貴之影像史料流失於民間之蒐藏家手中，無法公開呈現給國人大眾分享，這是最讓人遺憾的。

二、民間蒐藏家的意願限制

雖然政府單位受限於採購法之法規限制，而無法典藏到珍貴的影像史料。民間蒐藏家亦有少數較重視商業利益者，有見臺灣史料日益為國人所重視，相關文獻史料亦水漲船高的情況下，將各種臺灣史料哄抬的相當高，這特別表現在古照片上（其次則是古地圖及古契約）。昔日一張僅百元以內的日據時期之明信片，現今則是一張不下五百元，甚至有些民間蒐藏家叫價到八百元一張。而有些蒐藏家其以大量蒐集採購之途徑，更是讓人驚訝。例如在日本東京神田區的古書店，雖然是以蒐集舊文獻及書籍著稱，但倘若走進該地之舊書店，可發現到與臺灣史有關之書籍或文獻文物等，遍尋不及，早為臺灣來的蒐藏家採購一空。據一些研究臺灣史人士表示，臺灣的蒐藏家，早與該地之舊書店書商訂定契約，只要有與臺灣有關之文獻書籍或文物，必定大量蒐購，運至臺灣銷售再賺取利潤。吾人以為，此種採購途徑，雖可將與臺灣史有關之文獻史料，傳承至臺灣本土，不至留置於日本，但以壟斷之方式大量採購，對國內市場價格是否造成破壞，頗值得吾人憂心。

前瞻與建議

首先，如前所述，臺灣史至今以形成「顯學」，臺灣史料亦日益被國人積極發掘出來。但上述之臺灣史料也在有心人士的哄抬下，市場價格混亂，讓有心蒐集的政府相關單位窒礙難行，望而卻步。進而無法將珍貴的舊照片呈現給國人分享，頗令人遺憾。



再者，政府相關文獻等單位，倘若要認真蒐集珍貴的舊照片，作為文獻點藏的重點，則必需拋棄繁雜的法令限制，倘若只知以「不違法為原則」之行事作為，毫無開創性的話，其單位終究會為人民所淘汰。

其次，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國人日益對本土文化的重視下，與臺灣相關之史料亦迅速的被國人所發掘，但史料的解讀之工作卻極需專業且有史學素養者投入此艱困的工作，非圖書館內的行政人員所能勝任。若要將一張舊照片作基本的解讀，至少要將其拍攝的時間、地點、照片內容等3項作一簡略的說明，否則一張照片時空背景錯誤，地點張冠李戴，日後出版後更是以訛傳訛，相信這是

任何人所不願見到的。關於此，筆者認為至少要有二位學有專攻之不同領域之專家學者，每位學者再帶領2至3位助理共同執行此工作，如此才會有較具體的成果，且可減少不必要的錯誤發生。

最後，筆者以為不論是政府各相關單位；或是民間某大書商，其所呈現出的歷史均只能算是歷史中的一部分，而非全貌，是以兩者必需透過整合，即運用政府的行政資源，結合民間蒐藏家所典藏之舊照片，以「BOT (Build-Operate-Transfer) 興建—營運—移轉」之合作方式，才能建構出歷史的全貌；即一部真正的臺灣「全史」。



圖二：透過影像紀錄，保存昔日生活的樣態。圖為1930（民國19）年的東門城（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圖三：經歷日治與民國兩個政權的城門樣式。圖為2002（民國91）年的東門城現貌（照片由易明克攝影）